

# 时代的呼唤:《中国的西北角》成功要因分析

李秀云 朱孟艳

**摘要:** 20世纪30年代,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一版再版,连续出版8版,产生巨大反响。《中国的西北角》获得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范长江积极响应时代的呼唤,以新闻记者特有的视角,投身“西北开发”。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危机与国内阶级矛盾,引发了“西北开发”热潮,而范长江洞悉“西北开发”的要义,并积极主动地融入到以“西北开发”为宣传主旨的《大公报》的报道实践中。《中国的西北角》与《大公报》有关“西北开发”的宣传策略全面契合,成为《大公报》“西北开发”宣传报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正是范长江西北采访能够顺利成行以及《中国的西北角》取得重大成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关键词:**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西北开发

**作者简介:** 李秀云,女,教授,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天津,300387)

朱孟艳,女,传播学硕士生。(天津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天津,300387)

**中图分类号:** G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2012)02-0020-05

1935年,年仅26岁的范长江只身到我国的西北地区深入采访,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介绍川、甘、青、陕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以及中国工农红军情况的旅行通讯,首次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向处在国民党新闻封锁下的广大读者报道了红军长征的一些情况,揭开了当时神秘的大西北的内幕,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他的旅行通讯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后,连出8版,<sup>[1]</sup>轰动了中国舆论界,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迹。可以说,《中国的西北角》奠定了范长江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名记者地位。

关于《中国的西北角》能取得轰动性成功的原因,众多研究者已经进行了多角度考察。有人认为范长江“第一次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增进了人们对红军的正确了解和认识;在当时公开出版的书籍上,第一个在文章中称红军,并透露出红军是北上抗日的;对红军的行动方向、革命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sup>[2][45]</sup>。但也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范长江西北行的目的不可能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1935年7月才赴西北采访的范长江也不可能是最早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sup>[3]</sup>还有人从《中国的西北角》本身的语言<sup>[4]</sup>、所蕴含的人文关怀精神<sup>[5]</sup>以及所体现的地域特色<sup>[6]</sup>等角度对其成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中国的西北角》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范长江主动捕捉“西北开发”的时代精神,并且契合《大公报》鼓动“西北开发”的宣传策略,且以新闻记者特有的方式投身“西北开发”,也是《中国的西北角》能够获得巨大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

## 一、“西北开发”:时代的呼唤

由于西北地区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加之中国一步步沦为殖民地的屈辱进程,近代以来“开发西北”的呼声连续不断。近代中国曾经掀起过三次“西北开发”热潮,分别出现在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清末新政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sup>[7]</sup>特别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西北社会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特殊的意义,在东北沦陷、华北危机背景下,西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与抗战的胜利和民族复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蒋介石提出的“西南为抗战基地,西北为建国基地”之政策和国民政府开

发西北的战略影响下，西北社会成为全国的焦点，并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开发西北”热。从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到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3年多的时间内，国民政府陆续通过了有关西北问题的决议案多达十几项。<sup>[8]</sup>与此同时，当时国民党许多党政军大员如蒋介石、宋子文、戴季陶、何应钦、张继等纷纷到西北视察、考察、讲话，特别是张继与戴季陶，对西北开发非常热心，更是多次来到西北，倡导西北建设。对此，宋子文曾作过这样的评论：最近“中央的人，纷纷到西北，社会领袖，也纷纷到西北，到西北去，已成一种‘国是’了”。<sup>[9]</sup>而且，为鼓励国人赴西北考察，内政部还于1931年春制定并颁布了《奖励国人考察边境办法》。除对国人赴西南、西北边境考察给予明确规定外，还对考察者给予乘车半价优惠以及沿途各地区行政保护和协助等便利。<sup>[10]</sup><sup>[10]</sup>

在国民政府的号召下，“开发西北”成为当时的热门社会话题，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氛围。一时间，以研究西北为目的的学会社团纷纷创立。汪昭声指出：“忆民国二十年间，研究边疆之团体，风起云涌，全国统计，三十有七。”<sup>[11]</sup>而当时社会各界人士也以《西北问题周刊》、《西北言论》、《西北论衡》、《西北文化》、《开发西北》等著名杂志和当时有影响的《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等作为主要舆论阵地，纷纷发表评论，各抒己见、献计献策，阐述开发西北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开发西北、开发西北应注意的问题等等。<sup>[12]</sup>

有感于时代的召唤，诸多有识之士，以不同途径，纷纷奔赴西北，进行实地考察，并以文字记录西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俗、天文地理、山川物产等内容，多侧面反映西北地区的自然、社会风貌，形成事实上的“记者群”。宣侠父于1930年2月撰写的《西北远征记》，记录了1925年春至1927年夏他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工作期间的西北革命运动与当地的风土人情。1928年底到1930年1月，留学欧美10年归国的刘文海，借还乡奔丧之机考察陕西、甘肃、新疆等地，1933年出版《西北见闻记》。1929年，上海《新闻报》记者郭步陶应南京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约请，前往陕西、甘肃等地视察，行期49天，1932年出版《西北旅行日记》一书。1929至1930年，地质学家杨钟健参加四次地质考察，撰写考察游记《西北的剖面》。1932年8月至9月，顾执中随同陕西实业考察团进行考察，撰写《西行记》。1932年11月，在美国学习航空，有“女飞行家”之称的林鹏侠从上海出发，历时半载，考察西安、咸阳、兰州、西宁、张掖、酒泉、武威、宁夏、包头、张家口等地，1936年自费出版《西北行》一书。1933年7月，留美归来献身地质勘探事业的薛桂轮随南京国民政府某宣抚团进入新疆、青海、宁夏、甘肃、陕西等地考察，1934年出版《西北视察日记》。1933年夏至1934年初，明驼因事往返于兰州与敦煌之间，以游记体裁写下了《河西见闻记》。1934年3月至1935年5月，上海《申报》记者陈赓雅从上海出发，经北平、张家口、考察大同、包头、宁夏、兰州、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哈密、天水、西安、洛阳等地，旅途通讯先在《申报》发表，“备受读者之欢迎，并屡以发行单行本为请”<sup>[13]</sup>，1936年出版《西北视察记》一书。1934年5月，张恨水前往西北考察郑州、洛阳、潼关、西安、兰州等地，将沿途所见所闻写成《西游小记》。1935年，吴震华以欧亚通讯社记者身份，考察西安、天水、陇西、岷县、西宁、玉树、兰州、武威、张掖、玉门、敦煌、宁夏、五原、包头等地，1935年出版《西北徒步之一瞥》。马鹤天从1925年开始，总计10年间，深入西北各省区考察，1936年出版《西北考察记·青海篇》，此外还有《内外蒙古考察记》、《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等书。1936年，留学美国获教育学硕士与哲学博士的庄泽宣受教育部之请，到西北视察教育，实录成《西北视察记》。1937至1938年，历史学家顾颉刚率员在甘肃进行调查，撰写《西北考察日记》。1939年3月至12月，李孤帆以中国银行高级职员的身份，在甘肃、青海、四川、陕西等地公干之余，撰写游记《西行杂记》。

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各界都关注西北，并通过自己特殊的社会参与力和影响力，为西北开发尽力，开发西北的舆论热潮很快形成。正如范长江所言，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从报章杂志宣传讨论，

到要人的视察、专家的设计，以至于实际建设工作的进行。‘开发西北’的声浪震动了一般国人的耳鼓。”<sup>[14](62)</sup>

## 二、范长江西北采访计划与《大公报》“西北开发”理念的契合

对于范长江而言，他的西北采访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他不是西北采访的唯一者，却是众多西北采访者中的佼佼者。范长江西北采访成行与《中国的西北角》的成功，与他独特的人生际遇有关。

蔡晓滨在《中国报人》中写道，“1930年初，颠沛流离的范长江来到北京大学读书。此时的范长江身无长物，一贫如洗。为解决衣食温饱，他给北平的《世界日报》、《北平晨报》和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当通讯员，报道一些北大校园里的文化消息，挣点稿费，聊补困顿，生活比较艰苦。”<sup>[15](105)</sup>但是生活的艰苦并没有阻挡住范长江对于中国前途命运探索的脚步。1935年春，范长江得知红军北上抗日，他迫切地想到西部去了解红军的动向及西部的情况，却苦于没有一个公开的名义和经费。就在此时，《大公报》陆续在发表画家赵望云的旅行写生通讯，使他受到启发。“到中国的西南部、西北部去旅行，为《大公报》写通讯，又不要他们的差旅费和工资，只要付给稿费，对他们也没有什么负担，只要给我一个证件，一个名义，介绍一些地方旅馆和社会关系就行了。”<sup>[16](1178-1179)</sup>为此范长江拟定了详细的考察采访计划，说明为报纸写通讯，文责自负，不要差旅费和工资，只要一个名义和付给稿酬。《大公报》的经理胡政之在阅读后同意了他的采访计划，聘他为《大公报》特约通讯员，提供路费，出具介绍信，使他的西北采访计划顺利成行。

这其中有一段小插曲。范长江拟定的西北考察的计划书（没有透露研究红军的内容）首先交给了《世界日报》社社长成舍我，但是“成舍我认为范长江的考察没有新闻价值，计划书被退了回来。”<sup>[17]</sup>对此，也有人补充说，“成舍我对计划本身挑不出毛病，可他吝啬成性，对采访需要的几十至上百元钱，舍不得拿出来犹豫再三，他将计划书退给了范长江，找个借口说‘《世界日报》不需要这类报道。’”<sup>[15](106)</sup>因此范长江才把采访计划书转投了《大公报》，而当时的总经理胡政之阅后，则在第一时间约见了范长江并同意了其采访计划。

其实，胡政之对范长江西北考察采访计划的拍板并不纯属偶然，其必然因素是由于范长江的西北采访计划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国民政府20世纪30年代的“西北开发”政策，并且契合了《大公报》鼓动开发西北的宣传策略。

范长江去中国西北部采访的念头由来已久，他“认为将来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沿江沿海城市一定守不住，抗战的大后方一定在中国的西部（西北和西南），而这是中国最落后的地方，应当有些人去考察，发表文章。”<sup>[16](1176-1177)</sup>范长江的想法与《大公报》宣传立场不谋而合。“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就在社评中公开主张：“中国屈无可屈，和无可和，只有陷于长期的顽强的斗争。而积极经营西北，则长期斗争必要之条件也。”<sup>[18]</sup>“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很快意识到西北问题的重要性，并对西北进行了深入实际的报道。从1932年到抗战爆发前，《大公报》刊发了有关西北民情、景况的长篇调查报告、视察记、特写、游记多达数十篇。<sup>[19]</sup>《大公报》把西北作为救亡建国的基地，提出从交通水利入手，改革行政吏治，禁种鸦片，科学利用西北资源，恢复农业生产，培养西北人才，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实现西北整体开发等有价值的观点。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成为西北建设的主要倡导者、鼓动者及实践的督导者，是推动开发西北的重要媒体之一。<sup>[20]</sup>《大公报》以西北开发作为舆论宣传的重点，通过反复报道，强化西北开发在公众心中的重要程度，从而推动了公共舆论的发展。

况且，在范长江以前，《大公报》已有特派记者，不惜艰难跋涉，到西北进行考察。1933年8月下旬，特派记者李天织借绥新路试车通路之际，搭车去新疆，一路艰险，计程一个半月抵达新疆迪化。

当他从新疆返回时，已阅时近岁。途中遭遇战事，交通中断，尝尽幽禁之苦。<sup>[19]</sup>《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也曾两次西北行，写了《归秦杂记》、《归乡杂感》，他对西北深入地了解，使该报对西北问题的看法颇有见地。可见，范长江也不是《大公报》的唯一西北采访特派记者。范长江的西部采访计划能够顺利成行，与《大公报》一直关注西北开发，并且以特派记者的方式“参与”西北开发，紧密相关。

### 三、《中国的西北角》对“西北开发”时代主题的践行

“西北开发”是《中国的西北角》的核心内容，《中国的西北角》从一个侧面很好地展现了“西北开发”这一时代主题。范长江对他1935年5月10日到7月28日的旅行通讯作过这样的说明：“记者此次国内长途旅行，目的在从各个方面表现现实的中国。现实的中国整个的在变化的过程中，而且正沉沦于破落与痛苦的阶段。自然我所得的印象，不会是富丽与安静，即使有一些安乐的现象，他的背后实存在着无限的苦痛与辛酸。”<sup>[16](25)</sup>很显然，范长江不打算歌功颂德，而是想向读者真实地描述当时中国的现状，引起各方面对中国现实的正确认识，切实解决中国面临的深重问题，这种想法也一直贯穿着范长江的西北采访之行。

对于西北问题，范长江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日本侵略者的险恶用心。当时，日本侵略者为了掩盖其真实目的，散布种种欺骗性的宣传，说他们入侵绥远、内蒙古只是为了“借地防赤”，防止苏联的南侵。范长江对此指出：“记者以为中国人必须根本认定：日本侵略的主要目的地是我们中国。其‘防苏’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日本之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苏’，也不是简单的领土扩张，而是一种非常狠辣的对华军事大策略的实施。”他呼吁大家“用这种眼光来看中国的西北角！”<sup>[16](80)</sup>这种看法与《大公报》提出的把西北作为救亡建国基地的主张相契合，范长江在采访过程中很好地贯彻了这一主张。

#### 1. 阐释西北地区的战略意义

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紧密联系当时的政治形势，通过对大西北地区丰富的资源以及交通水利情况进行考察，进一步揭示西北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

对于“东南人士，每谓西北荒凉，意识中似乎认西北都是沙漠一样，想起来都可怕。”范长江首先改变这些人的错误认识。“其实，西北沃野正多，宜于人类生活之地区甚广，只因地位不同，气候有别，它的外形表现与生活方式，和东南各省区有若干异趣处而已”。“以甘肃而论，似乎应该是最不宜人生存的地区。然而事实上这是甘肃省内最肥沃的地区，这里雨水很少，然而却有雪山溶解下来的雪水，可资灌溉，致成异常宜于种植的地方”。又如，“关口山里，出产很好的煤和铜，铁和瓷土之藏量甚丰。”<sup>[16](126)</sup>这样，既澄清了人们的误识，又印证了《大公报》提出的西北地区资源丰富的主张。

对于水利问题，范长江明确指出：“宁夏社会，全赖渠水维持。而考渠政发达之历史，则远自秦汉唐各代皆有开凿。”“从其构造原理言之，不能不认之为深合乎科学，可见我们并不是如‘文明人’所说的‘劣等民族’那样不堪造就。”<sup>[16](263)</sup>同时，范长江对于“尤其令一般国人感到兴趣”的，也是“西北开发”以来，“所表现的最大结果”的西兰公路，给予充分关注。范长江通过亲身考察体验，失望地指出：“总之，西兰公路之现状，颇难令人满意。从旅客声中，流出两种口号，对路曰‘稀烂公路’，对车曰‘气车’。盖谓路既不好，而凡坐车者无不生气也。”<sup>[16](151)</sup>一正一反的考察结果，为《大公报》提出的“开发西北”从交通水利入手的看法提供了佐证。

#### 2. 揭示西北社会的黑暗

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范长江以大量的事实和篇幅，揭露西北地区的黑暗现状，反映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表达对下层人民痛苦生活的同情和怜悯。

在“民生之痛苦与政治之黑暗，为黑暗之河西之第一等黑暗地方”的安西，绅士与地方官互为勾结，鱼肉乡民，致使“民间村落十之五六已无人烟，多分别逃往哈密敦煌一带，就城厢而言，原有户口九百户，去年七百户，今年只有五百户。”范长江在从玉门回酒泉的路上，遇到了逃荒农民，他们

“一切收入缴了公款和高利贷，逼得自己没有吃的东西，只好离家逃往”。<sup>[16](232)</sup>

对于西北鸦片的泛滥，《中国的西北角》多有描述。《野猪关和茶岗岭》一文写到：“最可痛心者，是渭水两岸这样平坦富饶的川地，农民竟被政治经济种种力量，逼得遍种鸦片。”鸦片烟使人自甘堕落，形如柘柴，丧失精神和意志而破落不堪。“某君自文县来相遇，曾痛谓：中国再如此过活十年，这些地方的人口恐将至绝种了！”<sup>[16](118)</sup>

有关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则贯穿《中国的西北角》全书。《平武谷地中》一文指出，“途中行人，以军人及搬运军粮之士兵与民夫为主，中暑病倒之兵夫，络绎于途。”真所谓“生于乱离之世，不死于枪炮，亦丧于徭役，哀我农民，奈何无自救之方也。”<sup>[16](95)</sup>

《中国的西北角》通过对西北社会现实的考察，让人逐渐理清西北社会存在的各种盘根错节的严峻黑暗社会问题，深刻揭露西北行政吏治的极端腐败，表达其对鸦片之毒的痛恨。这也为《大公报》提出的整顿西北吏治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 四、结 语

不同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决定了不同时期能不能出现名记者，出现多少名记者以及出现什么样的名记者。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与国内阶级矛盾，引发了“西北开发”热潮，从而为当时新闻记者的成长提供了契机。范长江不仅是一位先知先觉者，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践行者，他以记者特有的敏感，洞悉“西北开发”的要义，并积极主动地融入到以“西北开发”为宣传主旨的《大公报》的新闻报道实践中。《中国的西北角》与《大公报》有关“西北开发”的宣传策略全面契合，从而成为《大公报》“西北开发”宣传报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不仅是范长江西北考察能够顺利成行的原因，更是《中国的西北角》取得重大成功的一个要素。

#### 参考文献：

- [1] 蓝鸿文.《中国的西北角》到底出了多少版[J].新闻战线,2006(8):50-51.
- [2] 胡愈之.忆长江同志[A].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
- [3] 尹韵公.关于范长江与《中国的西北角》之余论[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111-116.
- [4] 陈涛.范长江新闻作品的话语初探[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3):95-98.
- [5] 干芳洁、贺伟、张晓梅.论范长江西北之行的人文关怀[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增刊2):56-58.
- [6] 汪幼海.范长江通讯的地域特色[J].新闻大学,1995(2):30-31.
- [7] 蔡宇安.近代三次西北开发热潮探析——以陕甘宁青为例[J].宜春学院学报,2011(2):54-57.
- [8] 胡卫清.简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运动[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49-54.
- [9] 张用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政策取向[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121-128.
- [10] 陈赓雅.西北视察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 [11] 沈社荣.30年代范长江对西北民族问题新动向的思考[J].青海民族研究,2006(1):95-99.
- [12] 解程姬.20世纪30年代西北行记与西北开发[EB/OL].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05-15.
- [13] 尹韵公.范长江前的几位西北考察者[J].新闻研究资料,1986(2):154-159.
- [14]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 [15] 蔡晓滨.中国报人[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 [16] 范长江,范长江新闻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 [17] 刘霞.从范长江的西北采访看新闻记者应具备的“三识”[J].东南传播,2010(3):79-81.
- [18] 张季鸾.国家真到危重关头[N].大公报,1931-11-22(2).
- [19] 贾晓慧,华道云.《大公报》与20世纪30年代西北开发[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7-13.
- [20] 位娜.浅析抗战前十年《大公报》与西北开发[EB/OL].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05-01.